

田野的技藝

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

郭佩宜、王宏仁◎主編



◎巨流圖書公司印行

田野的技藝

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

郭佩宜、王宏仁 主編

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田野的技藝：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／郭佩宜、王宏仁主編。--初版。--台北市：巨流，2006〔民95〕
面：公分

ISBN 978-957-732-247-0(平裝)

1. 文化人類學-研究方法 2. 田野工作

541.3031

95001113

田野的技藝

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

主編：郭佩宜、王宏仁

出版者：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創辦人：熊嶺

封面設計：許慧芳

地址：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集英樓2F

電話：(02)86613898

傳真：(02)86615465

劃撥帳號：01002323

E-mail:chuliu@ms13.hinet.net

<http://www.liwen.com.tw>

法律顧問：林廷隆 律師

電話：(02)29658212

總經銷：麗文文化事業機構

地址：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F之2

電話：(07)2265267・2261273

傳真：(07)2264697

出版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

ISBN 978-957-732-247-0 (平裝)

2007年9月初版二刷

定價：350元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導論：非關田野，非關技藝

郭佩宜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）

王宏仁（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）

這本書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他們田野經驗的反思。田野不就是「田野工作」嗎？帶了筆記本和相機，到異地觀察和訪談蒐集資料的苦工。然而深刻的田野不只是自外的「工作」，田野或多或少轉化了研究者對知識、對世界和對自我的認識，也是自我追尋與成長的歷程。我們在這本書裡要講的，是需要經過十年沈澱才寫得出來的田野反思，不限於田野，也超越技藝。

如果你不是人類學、社會學等學科的學生，也不打算跨進這個領域，只要你對瞭解異文化有興趣，對瞭解研究者到底在做什麼感到好奇，這本書還是很有趣的。裡面有爆笑的窘狀、有悲傷的別離、有恐懼和徬徨的時刻、也有自剖和深邃的體悟。酸甜苦辣，不光是田野工作的寫照，也是人生的滋味。

田野工作與書寫田野

「田野工作」（fieldwork）的誕生是一段膾炙人口的傳奇。波蘭裔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（Bronislaw Malinowski）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初步蘭群島（Trobriand Islands）做研究，原本只是短期

調查，然而一次大戰爆發，殖民該地的英國與波蘭分屬不同陣營，他因此被迫留在當地超過兩年，因緣際會，發覺長期田野工作對於異文化的研究助益良多。在早期，研究者仰賴訛誤甚多、充滿偏見的二、三手的航行和傳教士紀錄，坐在火爐邊的搖椅上，想像遙遠的奇風異俗，被戲稱為「搖椅人類學家」。之後部分人類學者開始到異地從事短期調查，然而資料可靠性依舊有限。1922年是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中劃時代的一刻，馬凌諾斯基出版他在初步蘭群島研究的第一本書《南海舡人》(*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*)後，長期的田野工作——與當地人共同生活、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、參與觀察——成為人類學方法論與認識論的核心。「田野」成為人類學者的成年禮，沒有經歷超過一年的田野洗禮，就無法「轉大人」。

田野工作的理想是透過同理心 (empathy)，讓人類學者能掌握「土著觀點」(from the native's point of view)，而非侷限於研究者自身的文化、民族中心主義 (ethnocentrism)。這是人類學的重要挑戰和貢獻，也是人類學視角獨特於其他學科之處——人類學者是中介的，出入於文化內部觀點 (emic) 和外部分析 (etic)。這兩者達致的途徑有時是矛盾的，但那是田野的本質，也是人類學的技藝精髓；早期人類學界對於這個技藝常視為理所當然，在學科訓練中，也多半著重於研究計畫書寫和資料蒐集的技術層面的教學（工具書和研究方法課程），以及理論分析（其實就是每一門課！）。田野工作講求的「同理心」、「當地人觀點」、和「內部觀點」(emic) 要如何習得，其實很難在課堂上教學，就像謎一樣的神秘，只能靠自己摸索，彷彿在田野夠久，某一天就會突然「悟道」。那麼在兩種觀點中如何切換？那就更無

法言傳了。聽起來很玄，況且，也不是每個人都能修得正果，這讓田野工作更像神話，更有吸引力。

早期田野工作的論述基礎，將其視為科學研究的途徑，研究者抱著客觀實證的態度，藉由田野累積可靠的資料，歸納整理後書寫出當地文化（稱為民族誌），並做理論分析。古典民族誌與研究論文的書寫中，研究者雖然試圖呈現當地人觀點，但自己還是「客觀」的，作者／研究者在書寫中基本上是隱身的，只有蜻蜓點水的出現，讓學術著作呈現「專業」的樣貌。甚至「作者現身」的片段，後來還曾被批評是爲了建立權威，強調自己「到過、做過」（been there, done that）罷了。這樣的認識論立場，基本上假定了研究者的出現或是田野過程，並不影響到我們以「科學」方法調查所得的資料。

在這樣的典範下，田野經驗，尤其是田野中人性的一面的書寫，在學術界是被壓抑的。1950年代出版的李維史陀《憂鬱的熱帶》（*Tristes Tropiques*）是異類，稍早Laura Bohannan出版的*Return to Laughter*（可能是第一本這類型的書）甚至還得用筆名發表。而田野工作的祖師爺馬凌諾斯基的私密田野日記，在他過世後被出版（*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*，1967年），更是人類學界的震撼彈。日記揭露了他在田野中的另一面，有許多幽暗的情緒，和對當地人的抱怨。除隱私問題外，一開始很多人類學者認為此書出版造成學科的「危機」，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，看法逐漸改變。

其中很重要的是人類學的詮釋轉向（interpretive turn），挑戰了實證社會科學傳統，對田野工作的思考和書寫也截然不同。原本田野被視為尋求文化律則甚至人類普同理論的科學方法，然而

新的理論走向質疑了普同理論預設，也否定了「客觀研究者」的宣稱，田野過程中研究者的角色、主觀經驗、與當地的互動、權力位階關係、政治歷史脈絡等，都會影響我們對當地文化的認識與詮釋。1970、1980年代興起的「新民族誌」、「反省式民族誌」(reflexive ethnography)，實驗了不同的書寫方式，除了呈現田野過程中人類學者獲致知識的過程，也企圖透過新的書寫方式讓當地人發聲，並檢討田野背後的政治性。人類學界對這樣的嘗試褒貶不一，早期人類學者在作品中的假缺席，讓田野工作朦朧上神秘的面紗；新民族誌作者揭露田野過程，卻常成為作品的主角，被批評為本末倒置，自戀囁語（關於新民族誌的討論，可參考黃道琳在《當代》第八期的文章，〈社會生物學與新民族誌：當代人類學兩個落空的期許〉）。

但無論如何，田野主觀經驗和互動過程的重新檢視與思考，貼近人類學／社會學知識論的核心；超越個人經驗層次、細緻的理解背後的意義網絡及其運作，將有助於我們對文化、社會以及文化交會的理解。這是本書緣起的理論基礎，然而我們距離這個目標還有一段距離。

還缺這一本書

編者之一（郭佩宜）在大學時代讀到李維史陀帶著濃厚個人沈思味道的非典型民族誌——《憂鬱的熱帶》，深受撼動，因而與人類學結下不解之緣。人類學的大學教育中，閱讀的多半是經典、傳統民族誌，或學術論文，研究者與學術抽離開來。然而出

過短期田野、做了學士論文後，對學術傳統的異化式的書寫風格，總覺得摸不著學術研究的箇中況味。後來讀到 Marjorie Shostak 的 *Nisa* (1981)，以及黃樹民教授的 *The Spiral Road: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* (1989)，兩書透過相當篇幅描繪人類學者與主要報導人的互動，以及後者的生命史，生動呈現出田野的過程，以及從中對當地文化的瞭解。回過頭來看，這三本民族誌在人類學啓蒙時期具有重大的影響。研究所時接觸了更多「新民族誌」，以及當代人類學書寫與理論的辯證。除了整本書形式的反省式民族誌，歐美學界也已經出版了不少記述、討論田野工作過程的合集，用於課堂教學時甚受學生歡迎。

台灣人類學界和社會學界相關書寫還不多，多以零星短文或論文片段方式呈現。耕耘最深是胡台麗教授，從《穿越婆家村》起，她一系列的書籍、散文和民族誌影片，用感情豐郁的筆調娓娓道來自己的研究經驗，是台灣極少數跨界至大眾閱讀的人類學家。李亦園院士的《田野圖像》是另一個例子，自傳式的呈現了自身的學術歷程。以田野工作為招牌的人類學界都還缺乏中文著作，田野工作還不夠流行的台灣社會學界，相關書寫就更稀有了。我們發現，在學術養成階段中，除了理論的滋養外，對年輕人產生極大啓發的感動經驗，多半與學者「有血有眼淚」的生命歷程有關。許多學生是讀了胡台麗教授的文章與書籍，或李亦園院士的《田野圖像》，而對人類學產生興趣；幾年前翻譯成中文的《天真的人類學家》甚受學生喜愛；在2005年的人類學營中，學生認為收穫最多的是黃應貴教授主講的「人類學與我」，連同僚學者都聽得津津有味。上課發現學生開始精神渙散時，趕快信手拈

來一段個人田野小故事，保證全班眼睛一亮！因此，出版一本台灣學者的田野反思，重新反省田野這門「技藝」，與自己、同僚以及年輕學生一起探索——這樣的使命感促使我們出版這本書。

在社會學方面，近幾年來台灣的社會學研究幾乎朝向質化方向發展，在2005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上，機關刊物《台灣社會學刊》還大聲疾呼，需要有多一點的量化研究稿件，這可說風水輪流轉。我們在大學、研究所時代非常強調數量方法，但開始傾向質化，跟1980年代社會環境的氣氛轉變有關，當時剛解嚴，出現許多社會議題，量化的研究方法常常無法抓住發展的血肉，因此當時逐漸開始透過歷史、社會調查、訪談的方式來理解社會的變遷。

就台灣社會學的傳統來看，1980年代初有許多國外學成歸國的老師，這些老師帶進了許多不一樣的研究方法與視角，例如蕭新煌教授的台灣—韓國農業發展比較，柯志明教授比較台灣與中國的原始積累，謝國雄教授探討台灣的勞動體制，葉啟政教授對台灣／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，到陳東升教授所探討的派系金權政治，都是以訪談、歷史材料來進行學術研究。這樣的方法，大大影響了我們這一代的研究方法，例如在中國研究（劉雅靈、吳介民、陳志柔、陳明祺等），或東南亞研究（如龔宜君、張翰璧）、移民研究（曾熾芬、趙彥寧、藍佩嘉、夏曉鵲）等領域，就很少看到以數量方法來處理相關的議題。

此外，文化研究的衝擊，也進入到社會學的領域，假如人類學出現「有了文化研究後，人類學還剩下什麼？」的質疑，社會學的狀況也不可能置身此影響之外。這是全球知識生產的巨大轉變，以前甚少被質疑的知識論問題，在文化研究風潮下，被逐一檢視，也因此傳統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不斷被挑戰，連帶也影響傳

統以問卷、統計方法來進行的社會學研究。

雖然社會學界逐漸轉向以質化方式來研究，但很少有學術的專書談論此方法背後所隱含的社會／學術意義，或許在一些序當中可窺知一二，例如謝國雄在《茶鄉社會誌：工資、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》的序言寫道：「時常在徬徨中摸索：或因為田野材料的不夠細緻而苦惱，或因為無法釐清理論上的思辨而煩悶，或因為無法讓二者有貼切的對話而擲筆，或無法提出原創的論點而望洋興嘆。田野苦，分析苦，寫書更苦……。」其實田野調查豈止苦，有時個人情緒問題、人際網絡困境、甚至性生活，都是在學術報告中無法呈現出來的。

至於社會學的質化研究方法，與人類學傳統的田野調查有何差異呢？以質化的訪談方式來進行研究，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，只是「蜻蜓點水」而已，可能還被戲稱為「搖椅社會學家」。這裡我們無法回答此大哉問，讀者或可以從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的作品中感受到味道，也可從本書的田野經驗來體會，到底這兩個學門是否真的差別這麼大。在學科界線日漸模糊的今日，本書中呈現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田野，比較接近連續的光譜，而非清楚二分的類型。

那麼為何不翻譯一本國外出版的合集就好，而集合了台灣的年輕學者進行這項計畫？一方面我們覺得國內學者的研究歷程對本地學子較具親切感，無論是熟悉的地名如永康街、太魯閣、東勢和鹿港小鎮，毋須多做背景說明的排灣族、太魯閣族、客家和台灣漢人，台灣人都耳熟能詳甚或有親身體驗的921地震、社區營造、台商和外籍勞工、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等議題，在閱讀過程中較能貼近本地讀者的經驗，而較容易進入文中脈絡。另外，本書的作者都是台灣的年輕學者（開忠也算是「台灣人」），文中常提及的求學

歷程（包括在台灣念大學以及在歐美澳等國留學）與研究軌跡也值得同學參考。另一方面，這些台灣學者的田野工作也因爲「台灣」的關係，有不同於英美學界的特殊性。有些狀況是因爲「台灣人身分」產生的，有些課題則是因爲台灣社會現象而引發的。除了上述關於921地震、太魯閣族正名運動、台商研究等非常本土的議題外，本書提及的一些海外研究也與研究者的「台灣性」息息相關。例如雯勤在泰國研究國民黨孤軍，遇到泰方許可問題；開忠在台灣求學經驗影響他對馬來西亞政治和白色恐怖的體會；佩宜被稱爲「白人」而感到荒謬，與一般白人研究者的感受有所差異；宜君面對「華商」對其台灣人身分的懷疑，轉而研究「台商」；綺芳在竹富島遇見日治時期曾來台，會唱台語歌的當地人。研究者自己的台灣背景和認同，以及當地人怎樣想像「台灣」和「台灣人」，影響了這些研究者的田野——這是本書田野的特殊性。

雖然我們覺得理論上尙無法提出更深層的突破，此時出版這樣的一本書也依舊冒著被批評「不學術」、過度強調個人經驗的風險，但我們覺得跨出第一步還是必要的。同時，人生不只是學術研究而已，這本書希望與讀者分享的除了研究與知識建構的歷程外，還有「自我成長」的體驗。

田野經驗到底對研究者的意義爲何？就像人生經驗一樣，田野中發生的許多事情，需要時間的洗禮，才更能明白其蘊含的深刻意涵。爲了這個計畫，大家又一次重新翻閱了自己剛進田野時的日記，閱讀那個青澀的「我」，和筆下田野生活的點點滴滴。赫然發現在田野當下記錄的事件和心情，與多年後再回顧反思相比，語調已然改變。若是在剛離開田野時來書寫田野，對田野經驗的敘述方式，和田野經驗對個人的研究與生命思索造成什麼影

響的認識，顯然會深淺不同。這是本書11位作者共同的感覺——在經過更多生命經驗的磨練，和學術閱讀與寫作的累積後，回頭看待過往的田野路，更能夠咀嚼出其中的韻味，也更能了悟。本書的作者都還「自我認知」是年輕人類學家／社會學家，或許等我們成為更成熟的學者後，對本書提及的種種田野經驗，又會有不同的詮釋，也更能參透其中的奧妙吧。

看透衆聲喧嘩的知識後台

此書或可看成揭露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知識生產的後台，一窺研究者是如何蒐集資料、獲致研究論點、寫成學術論文發表。我們看到的是複雜的、衝突的、情感的、主觀的動態過程，而非條理的、理性的學術論文寫作。作者們有時不遮掩自己的糗態、不諱言自己情感的波動，有時也坦然承認自己當時犯的錯誤。多位作者也重述了如何在田野中透過錯誤的嘗試、當地人的點醒、以及自己的反省思索，卸下部分的文化包袱，達致對當地文化更深層的理解，而在研究課題上有新的突破。

對讀者而言，這是學術研究的後台，可以看到隱身在學術作品後面穿梭的、活生生的人，和他們怎麼找到那齣戲的靈感。然而對許多作者而言，卻不見得是後台——田野是我們生命體驗的一環，未必能夠清楚切換，出入田野也不是收放布幕那麼輕鬆。秀幸在老家做田野，何時是出，何時是入？邵武在921災後待在東勢田野地，他是災民還是田野工作者？綺芳帶著女兒去田野，參加女兒的運動會，是台前還是台後？在韻芳的經驗中，田野地

親人的死亡，和父親去世的情感衝擊交疊，何者是何者？

到過國外旅遊、有異文化接觸經驗的讀者，應該不難發現彼此雞同鴨講時常鬧笑話，本書中也有不少這樣的場景，令人莞爾。然而書裡面也有很多挫折，和沈重的問號。這也是田野的本質！田野是生命經驗，是不斷自我辯證的過程，不是上了車、下了飛機、回到家就能輕易放下的。無論是一路丟丟撿撿的包袱，或是怎麼也放不開的臭毯子，都必須從自己內心去摸索，需要親自品嚐、咀嚼和消化。許多問題我們還沒找到答案，或許也沒有標準答案，這些就有待讀者與我們一起思索了。

同樣的，我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對處於學術生涯和人生不同階段的讀者，產生不同的意義。初入門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鮮人，上過研究方法論課程的大學生，實際做過短期、長期田野、寫過論文的研究生，或是田野工作的老鳥，在閱讀本書各篇文章時，可能有不同的共鳴感動、不以爲然、或是恍然大悟。我們企圖在書中含括了不同面向的田野經驗，希望讀者能在不同的生涯階段，重新翻閱這本書，而有不同的收穫。

然而這個「後台」，也只是透過我們的記憶和觀點呈現出的「後台」。倒過來，被研究者又如何看待這些闖入的研究者？在雙方交會的過程中，被研究者又發現、體悟了什麼？我們無法代言，期待有另一本書的出現，由當地人來說說他們對「田野」這回事的觀點和故事。

田野技藝的第一門課

這本書在書寫時，我們預設的主要對象是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入門的學生。書中有各式各樣的田野情境、困難和解謎。這是田野的建構、解構、和重構的過程。在討論書名時，我們考慮過把它叫做「田野 101」——101 是美國許多大學對學科基礎課程的編號，任何一門學問的導論課，課號都是 101。這本書在很多方面是田野工作的「教戰守則」——有作者剖析她是如何決定到東南亞研究台商、找到受訪者（宜君），有作者（雯勤）述說她如何「遇見田野地」的經歷，撰寫研究計畫以及申請研究許可。有作者描繪自己如何「參與觀察」（綺芳、佩宜）、如何面對當地階序概念與操作（坤惠）以及人際間的微政治（micro-politics）（雅仲）、和研究者／被研究者的位階問題（宏仁、佩宜）。這本書不但是田野的「教戰守則」，也是「交戰守則」——我們在田野中和自己的成見拔河（宏仁）、和當地人的成見拔河（佩宜）、和自身情感糾結（秀幸、韻芳）、和「白色恐怖」交手（開忠），甚至賭上生命安危（邵武）。

但這本書不是田野指南或者技術手冊，我們不是要講怎樣找資料或怎樣訪談，我們談的「田野的技藝」不只是技術，也不侷限於田野當下，而是透過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的三者共構，形成的學術實踐。田野的技藝是一門藝術，要細細品味，才能心領神會。

本書含括了範圍很廣的研究地點——從台北市的永康社區、鹿港街頭、苗栗客家庄、東勢災區、花蓮和屏東的山村、越南的胡志明市、砂勞越的河港、泰北邊境、八重山島、到所羅門群島

沿海聚落，每位作者研究不同的區域，面對不同的當地社會文化，和不同的研究對象，自然有不同的互動經驗——所羅門群島愛好平等的Langalanga人、排灣族的貴族與平民、和越南工人，面對外來的研究者，想法是不一樣的。而研究課題也是多樣的——從法律與地方制度、移民網絡、台商策略、社區運動、轉宗經驗、命名政治、民間宗教、地景與歷史觀、到舞蹈與身體經驗；如此豐富多元的研究主題，讓每個人進入田野碰觸的經驗殊異，觀看的視角分歧。

這樣的差異與多元，乍看缺乏一致性，然而那正是田野的特性！田野工作是研究者（及其社會文化）與當地人（以及當地社會文化）在特殊時空遭逢，相互碰撞的過程。一種米養百種人，何況我們研究的地方不見得吃米！當我們誠實的檢視田野工作，就必須承認研究者不是客觀的，而是主觀的；研究者介入研究過程，而被研究者也同時形塑了田野工作的過程和結果。這本書恰能呈現這樣的本質，也表達了田野工作沒有唯一的模式，多元性是田野工作的特色。然而這不表示每個人的田野工作缺乏任何共通性。相反的，書中這些多樣的經驗，也呈現出田野工作者幾乎都要面對的一些重要課題。

知識生產的飲食男女過程

如果這本書談的是人類學和社會學學術研究的後台，那當然也得同時揭露這本書知識生產的後台了。當我們聯絡好可能的作者後，約大家第一次聚會見面是在2004年底，那時有哪些人選願

意加入陣營，要寫什麼內容，其實都還不是很確定。當然，佩宜跟宏仁都在想：如果賣個百萬本，那麼大家下半輩子就靠這個吃飯了（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！），所以找個通路好的出版社，對於達成此目標，應該有很好的幫助。因此我們先聯絡了巨流出版社的巨擘兄，請他當天也到場來聽聽我們的想法。根據他的專業判斷，這種以台灣學者田野調查／質化研究經驗的書籍，市面上還沒有，應該有賣點，他的這一席話，鼓舞了在場的人。

我們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面，除了寒暄外，也談談自己打算寫哪個主題。雖然還不確認整本書的主題，但共識就是「先回去寫吧！」，許多的書寫是「形成」的（in formation），而非計畫中的，這就如本書作者們的田野經驗，許多非預期的因素，以及需要時間沈澱的經驗，很難依照規劃邏輯來預設目標，假如發生像邵武那種「危險的人類學家」，連田野對象都消失了，那怎麼辦？此次聚會令我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情，是綺芳從花蓮後山帶來了日本沖繩的黑糖，那種幼時甜蜜滋味，溫潤了在場每個人的心房，而綺芳這個「好習慣」在後來仍繼續保持，讓每次的討論都在愉快的飲食田野中度過！

第一次正式討論，是趁著舉辦2005年台灣東南亞研究年會時，我們順便把這些朋友都找來暨南大學當評論人，這次書寫的11個人當中，在暨南大學任教的就占了快一半，在暨大開第一次會，似乎「很自然」。這次報告的人是開忠、坤惠與佩宜。因為第一次正式討論，所以如何進行，跟大家的田野經驗一樣，也是逐漸摸索出來。大家在討論前都已經閱讀過草稿，加上各人的田野經驗都很豐富，討論起來非常熱烈。開忠寫了恐怖的政治經驗，但在報告時，幾乎都是在講伊班人的民族誌，大家也就建議

他把那部分恐怖的感受描寫得更多點，對於沒戒嚴經驗的新一代，應該有啟發性；佩宜專門說故事，講她的「我要去海邊溜溜」經驗時，笑翻了大家；坤惠談到了命名政治學，讓人驚訝於原來姓名也可以這麼政治，與最近剛聽到的事情很類似：「可以轉信穆斯林，但穆斯林教徒，不可能轉信其他宗教」，這是個嚴重的禁忌，那麼在中國人的家族信仰中，可以改姓嗎？這當然也是一個禁忌！

第二次的討論轉移到靠近核心的半邊陲地區：新竹的交大，由雅仲與秀幸負責場地與住宿的安排，客家學院的院長莊英章教授協助我們的研討。上次在暨南的時光，因為開會的前一天還必須工作（當會議主持人或評論人），因此少了「會前會」的討論，但這次的交大討論，我們先安排了前一晚的住宿會談。當大家坐在佩宜的房間聊天時，雯勤突然冒出一句話：這是我一輩子以來住過最豪華的飯店。原來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還是有點等級差距的：宏仁跟宜君都住過更高級的飯店！宏仁猜想，人類學者應該都是住「滿天星」級的飯店吧！這種非正式的閒聊，是促進交流更重要的場合，很多想法也是在此激盪出來，跟日本人常說的「後啦！」（看吧！），意思一樣。隔天在教室裡面的討論比較正式，雖然氣氛還是如朋友在閒聊般，但是經過一夜長談，整個空間氛圍給人的感覺就完全不同了。

第三次討論在六月移師到台北中研院，越來越靠近核心了（或說，已經在核心了？）由雯勤與佩宜來組織，亞太區域研究中心的蕭新煌執行長贊助我們的討論與演出，蕭執行長不僅來開幕致詞，還聽了好幾場的討論，並且丟下一句話：「你們要告訴讀者什麼重點？」這句話讓我們後來在花蓮場的討論「爭執許